

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

〔日〕谷川道雄 主编



中華書局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

〔日〕谷川道雄 主编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日)谷川道雄主编;李凭等译. -北京:中华书局,2010.10

(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

ISBN 978-7-101-07407-9

I. 魏… II. ①谷…②李… III. 中国-古代史-魏晋南北朝时代-文集 IV. K23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75932号

书 名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
主 编 [日]谷川道雄
丛 书 名 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
责任编辑 王 芳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0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0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毫米 1/16
印张24½ 插页2 字数380千字
印 数 1-3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7407-9
定 价 48.00元

《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汉译本序

佐竹靖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契机下，全球一体化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是近年来电子网络的发展，将世界各地瞬间连接在了一起。这样，历史研究也可以站在整个人类的高度来进行了。

与此同时，人类还共同面对着资源、环境、人口等诸多重大课题。这些问题提示我们，当今人类的存在本身就受到了极大的局限，而且，更严重的问题是：还包含因可怕的核战争而导致人类灭亡的可能性，事实上是由人类自身创造出来的。

可以说，这些事实昭示了人类正面临某种意义上的落幕。这是否会变成如文字所说的落幕即人类的结束？还是人类跨越这一考验，站在更高的层次迈出下一个历史的第一步呢？这些问题令人难以预测。

面对这种考验，我们能够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重新探索人类走过的道路即人类的历史。

我们作为过去人类存在的结果而生存于今天，如果能够认识过去的我们的

存在究竟是怎样一种状况,或许对我们的未来能够投下一缕哪怕是朦胧微弱的光亮。而且,构成中国历史的人数如此众多,展开的场面如此宏大,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自然成为极其重要的研究对象。以此为目的,构建一个汇集我们力量的最基础的平台,这便是我们在日本出版《中国史学の基本問題》(《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时的初衷。

问题摆在全人类的面前,我们作为全人类中的一员也不得不接受这些问题。出于这种观念,本书将各论文作者通过各自的兴趣和思考而提出的、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基本问题和思考的问题作为本书的课题,这些问题不应只限于专业课题,还应当使我们的后辈及学生们能够理解。通俗易懂地提出来的问题,我们的后辈及学生们才有可能理解。他们对这些问题持有的肯定或否定的态度以及通过以此为基础的实践,或许能对当今人类的前进步伐和课题产生一些影响。换言之,本书的直接目的有两个,一是系统地认识各位作者作为专家所理解的重要问题的意义,其次是使其成为能够引发年轻研究者兴趣的入门性读物。

以此为目的所编纂的《中国史学の基本問題》(《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于1996年出版了第一卷《宋元卷》,翌年的1997年出版了第二卷《魏晋南北朝隋唐卷》和第三卷《明清卷》,最后于2001年出版了第四卷《殷周秦汉卷》。

《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丛书在日本出版后不久,我们便着手为出版该书的汉译本而努力,其中的《明清卷》以该卷主编森正夫为主,决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另外的三卷于2004年与中华书局商定了出版协议。

随着时光流逝,世人目睹了中国现代化的飞速发展,更有了大量的新资料的发现和公开。从这两点来看,可以说本丛书已经稍有些落伍。对于此次汉译本在中国出版,有的学者为此有些顾虑,也有意见认为不做什么修改便发表是不负责任。另外,这套丛书原本是以日本国内的学生及年轻研究者对象而编纂的,完全没有预想以中国本土的研究者作为读者,因此,有的学者对在中国本土出版这种所谓的“内部刊物”抱有消极的看法。

尽管本书的作者们提出的这些看法确有道理,但我们最终还是下决心出版

这套丛书的汉译本。坦率地说，这是因为我们热切希望自己的研究为中国的学者们所理解，或许理解之下会有严厉的反驳和批评，我们期待得到各种指教。

虽然日本社会在东亚世界中受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但却拥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当东亚世界受到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直接影响时，两国的关系进一步产生了重大变化。我们这些置身于两国历史关联中的日本研究者，正是希望认识中国历史的真实面貌并以此帮助认识日本历史的真实面貌而进行的这项研究，希望中国本土的研究者对在这种历史条件以及我们对此做出的回应和努力下形成的日本的中国史学研究的现状予以理解，并使我们获得诸多的批评意见，这是我们日本研究者的极为坦诚的愿望。

为此，我们下决心在中国翻译出版这套留有若干缺陷的丛书。为适应中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和新资料的大量发现和公开，我们也曾讨论过对丛书加以修订，但最终的结论是我们难以完成如此的工作，所以，本书基本上是按日文本原样翻译成汉语出版的。这样一来，给尤其是因考古学资料的剧增而大受影响的《殷周秦汉卷》带来了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希望中国读者对本丛书以下两点局限予以谅解，一是本丛书在某种意义上有些落伍，二是本丛书原本的设想是以日本国内的青年研究者为主要读者的“入门书”。

同时，我们在本丛书的日文本中汇集了对中国史学之“基本问题”的认识，期待能取得超越某些局限的成果。不论什么时代，基本问题都不会轻易地改变，而且基本问题在初学者和专家之间是共同的。我们由衷地期望这种愚拙的尝试能够得到中国学者们的批评指正，成为确定更具普遍性的“基本问题”的第一步。

最后，想就本丛书日文本的编辑和汉译本编辑之间的若干差异做一点说明。

本丛书日文本的编辑工作是按以下基本方针进行的，即各卷的编委们以其责任编辑为主进行编辑工作，即第一卷责任编辑为松丸道雄、古贺登，第二卷为谷川道雄，第三卷为佐竹靖彦，第四卷为森正夫，佐竹同时兼任第一、二、四卷的

编委,负责全书的协调工作。

与日文本不同,汉译本采取的形式是各卷只设置责任编辑,佐竹靖彦作为主编,统筹全书的工作。方针的改变是因为作为已完成的日文本的中文翻译,工作量明显减少,同时与中国方面联系协调时需要更有效的对应。因此,此次各卷的责任编辑为第一卷佐竹靖彦,第二卷谷川道雄,第三卷近藤一成,第四卷如前面所述,以森正夫为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一卷的责任编辑由松丸道雄、古贺登两位改为佐竹,原因是该卷由于有新出土资料的大量增加,该卷的编辑和作者对不经过相应的修改就出版该丛书抱有非常谨慎的态度,认为带着那样的缺陷出版,作为研究者难以积极去运作。对此,身为全书主编的佐竹充分理解这些问题,但鉴于出版计划的全盘考虑,希望仍按原样出版。应此请求,第一卷的编委们考虑如果由佐竹来担任责任编辑,也可以出版,就此本丛书的出版成为可能。

所以,本丛书的编辑责任和功绩基本归于日文本的编者,中文翻译的编辑责任和功绩归于汉译本的编者。以下再次注明日文本和汉译本的编者姓名,以供参考。

日文本

第一卷责任编辑松丸道雄、古贺登。编委永田英正、尾形勇、佐竹靖彦。

第二卷责任编辑谷川道雄。编委堀敏一、池田温、菊池英夫、佐竹靖彦。

第三卷责任编辑佐竹靖彦。编委斯波义信、梅原郁、植松正、近藤一成。

第四卷责任编辑森正夫。编委野口铁郎、浜岛敦俊、岸本美绪、佐竹靖彦。

汉译本

主编佐竹靖彦,第一卷责任编辑佐竹靖彦,第二卷责任编辑谷川道雄,第三卷责任编辑近藤一成。

(吕静译)

目 录

-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基本问题总论 /谷川道雄(1)
- 中华世界 /堀敏一(24)
- 唐代的对外贸易与在华外国人的相关问题 /石见清裕(44)
- 论胡族国家 /川本芳昭(69)
- 南北朝时期的蛮酋 /谷口房男(88)
- 吐鲁番的古代社会
——新兴平民阶层的崛起与望族的没落 /白须净真(108)
- 皇帝制度
——日本战后对汉唐皇帝制度的研究 /金子修一(132)
- 六朝贵族制与官僚制 /中村圭尔(155)
- 国家与政治 /窪添庆文(174)
- 律令法 /池田温(193)
- 农业社会史 /大泽正昭(236)
- 六朝时代的江南社会与道教 /都筑晶子(256)
- 书法文化 /宫崎洋一(279)
- 社会与思想 /吉川忠夫(299)
- 城市的生活与文化 /妹尾达彦(317)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基本问题总论

谷川道雄

一、前言

如果对作为今日世界契机的战后的半个世纪作一番粗略的回顾,大致可以包括,二战的结束和继之而来的围绕冷战体制展开的世界政治的诸阶段,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期骤然发生的东欧阵营的瓦解和冷战结构的终结。这样看来,战后五十年,作为一个时代,确已完结。但是,若要问在它完结之后,下一个到来的将是什么时代,恐怕任何人都不可能给予明确的答复。世界各地出现的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尖锐的民族、宗教冲突,妨碍着和平进程。展望未来,前程未卜,或许会发生用原来的观念无法预测的事态。可以说,人们正怀着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企图从过去半个世纪中找到某种线索。

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也是在这五十年当中进行的。总结这期间的研究成果,面向未来,确定研究的进程,将是当代研究者的责任。但是,正如对现实世界进行总结和展望极为困难一样,完成这一学术上的任务也非易事。本书是

在努力向这一难题挑战的意图下策划的。特别是当笔者撰写其中总论的时候，面对此重大课题，深感力不从心，这是我心境的真实表白。

但是，不管采用多么粗放的手法，也总得找一个地方切入。为此，我想或许能从自己过去曾经论述过的主观想法中得到一些帮助。这里，请允许我引用其中一段文字：“关于六朝社会基本性质的论争，至70年代后半期前后大体已告结束。虽然其后一些精湛的研究还在不断地涌现，但是可以认为，80年代以后的特点是，研究者之间极少有共同关心的问题。各人的兴趣千差万别，而且研究领域细化的情况日趋严重。”（《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回顾》，载《中国史学》第2卷，1992年）

关于这种研究倾向变化的产生原因，我做了如下思考：“这种情况从何而生呢？回答这一问题恐非易事。因为这与其说是学术界内部的问题，倒不如说是拓展到学界之外的社会面貌变化的产物。就笔者的直觉而言，日本经济高度增长带来的社会副产品之一，就是人们有脱离意识形态的倾向。充满激情的使命感业已完全冷却，人们被一种务实的心态所统治。在历史研究中，与时间的联系相比，对逐个的现象更具有强烈的关心。而且，对一个现象，也不是就其逻辑和意义提出问题，而是讨论其形态和功能。”（同上书）

当时我曾指出，战后五十年日本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基本上可以说成是中国史研究——以70年代为分界线，前后可以一分为二，将前半期与后半期作一比较，研究者的倾向显然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看法，现在基本上没有改变。直截了当地说，前半期是论争的时代，后半期是与之相反的、没有论争的个别研究的时代。如前文所述，这一剧变的背景是社会面貌的改变。然而，研究者的研究意识是能够相对独立于社会变化之外的，而且也应该保持独立。但尽管这样，为何会产生如此截然不同的变化呢？是否这种看似截然不同的变化只是表面现象，而其底流则是前期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依然被后期继承下来了？对这些问题都必须慎重地加以研究，但至少可以认为，对于前期的研究课题，即使是批判地也好，也并没有被有意识地继承下来，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换句话说,难免令人作出这样的推测,在前期的研究成果和课题还没有充分消化的情况下,就转入了新的领域。本文拟首先提出论争中所包括的问题,特别是关于魏晋南北朝(以下称六朝)、隋唐史研究视点的问题,然后就当前如何开展这些问题的讨论,略抒己见。

二、六朝、隋唐史的两点观点

借用岛田虔次的说法,“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论争的历史”(《亚洲历史研究入门一·序论》,同朋舍,1983年)。若举论争的中心题目,仍然是中国史的分期问题。即使并不是直接论争分期问题,但就各个层面进行的议论也都与这一问题相联系。在具有不同立场、不同研究方法的研究者之间,展开这种论争的动机是什么呢?用前引拙文的话来说,这不外是由于“研究者之间有共同关心的问题”。他们关心的问题之所以产生出这种共同性,说到底,还是因为日本战败这一现实。

明治以来成长发展起来的军国主义一朝崩溃,对于史学界来说,也是使人反省自身责任的重大事件。在中国史研究领域,重建中国史学也就成为当务之急。也就是说,从上古至现代,用一贯的进步主题构建中国史的体系,已迫在眉睫。分期便是这一体系化的重要手段。战后的学术界执着于这一问题乃理所当然。

关于中国史的分期,有所谓的京都学派分期法,它始自战前,为内藤湖南首创,后由其门下弟子所继承。当时,这一分期法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战后,对重建中国史抱有强烈愿望的历史学研究会系统的研究者建立了与此思路迥异的分期法。1948年前田直典发表的《东亚古代的终结》一文就是最初的尝试^①。其后,经过西岛定生、堀敏一、仁井田陞等人的工作,新分期法逐渐形成,其间虽有所修正,但基本框架没有改变,和京都学派的构想保持对立至今。

^① 收于《历史》1—4;后收于铃木俊、西岛定生编《中国史的时代区分》,东京大学出版会,1957年;又收于前田直典《元朝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

当然,这种对立今天似已失去实际意义。我曾经把它们比喻成永远并行前进的双轨^②,但早已尘封,无人提起。可是,当初经过如此热烈论争的上述主题,难道现在就真的无意义可言了吗?

有关这两种观点的对立之处,今天已无需加以介绍,其焦点在于:所谓唐宋变革,究竟是京都学派所说的从中世到近世的转变,还是历史学研究会派所主张的从古代到中世纪的发展?在这里,所谓古代、中世、近世,并不是单纯的名词问题。这些时代称呼虽含有各自的意义,但论争双方对其都有着较为一致的理解,否则也就形成不了论战。如后所述,以同欧洲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进行比较为前提,是两种观点的一致之处。欧洲史同时还是近代世界的创造者,所以上述比较意识自然就涉及到了中国史与近代世界的关系问题。

如果说上述两种说法存在着这样的基本差异的话,那么成为论争最大焦点的,便是六朝隋唐时代。因为京都学派称这一时期为中世(以下称为A说),历史学研究会派则把这一时期看作是位于秦汉延长线上的古代(以下称为B说),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前引前田的论文涉及到了此一时代问题,就此引发了有关时代区分的论争,这或许可说是势所必然。

那么,两说之间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呢?

先从A说谈起。A说的创始人内藤湖南从内外两个方面构筑了中国史的体系。一个方面是皇帝政治运作方式的转变^③,另一个方面是中国和周边民族关系的消长^④。拿前者来说,中国政治在清朝以前可以分为贵族政治与君主独裁政治这两种形式,而两者的分界线则划在唐宋之间。上古以来至唐代,主要为贵族政治的时代。所谓贵族政治,简言之,就是贵族阶级的联合政治,君主只是贵族之一员。周代封建制,是上古贵族政治的典型。秦汉时代虽表现出了某些君主独裁政治的倾向,但本质上仍是贵族政治。六朝时期,这一政治形式有

^② 《从现在的眼光考察中国史的分期问题》,载《史林》68—6;后收入谷川《中国中世的探求——历史与人》,日本编辑学校出版部,1987年。

^③ 《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载《内藤湖南全集》第八卷及第十卷等,均阐述了这一构想。

^④ 《中国上古史》,载《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卷,阐述了这一构想。

了进一步发展。至于隋唐,则可以理解为君主企图压制贵族阶级的势力却又力有不逮的时代。也就是说,贵族政治的时代亦以秦汉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期,借用内藤的表述,后期即六朝隋唐时代乃“贵族政治最鼎盛的时代”。

这一表述虽稍欠明朗,但内藤毕竟对这一时期贵族政治的起源和性质做出了简明的定义。他指出,六朝贵族既不是氏族贵族,也不是武人出身的领主阶级,其基础是已成为地方望族的官僚世家。这个定义有两层意义:其一,六朝贵族已非古代贵族,他们是历经官僚制时代亦即皇帝政治的时代而形成的中世贵族;其二,虽说是中世贵族,但并不等同于欧洲、日本所看到的领主阶级。质言之,六朝居中国的中世时代,但却是与欧洲、日本的类型截然不同的中世。

内藤湖南的分期论的另一个着眼点是中国和周边民族的关系。内藤认为,在古代,中国文化呈向周边地区扩展的趋势。但是,当这一扩展促进了周边民族的觉醒时,那种力量就转而向中国内部发生作用。当这种由内向外的扩展转变为反作用时,就形成了中世社会。然而,在转向之际,有一个运动暂停的时期,构成了过渡期。具体来说,就是自东汉中期至西晋的两个世纪。在那以后,五胡十六国、北朝以及胡族色彩更浓的隋唐时期相继到来。

沿着内藤的分期论思索,就会发现上述两个方面是非常接近的,至于这两个方面相互的关系如何,他却没有言及。然而,把中国文化自内向外扩展继而又自外向内发生作用的逻辑应用于贵族政治的发展,并非不可能。即可以认为,中央文化(特别是儒学文化)波及到地方,促使官僚阶级诞生,进而又促成了地方望族的形成。换言之,如果将两方面统一起来,所谓的中世社会,就是古代社会发展至顶峰产生质变而形成的时代。这些姑且不论,今天仍然作为六朝隋唐史基本课题的贵族制及胡汉关系这两大主题,实际上当时已由内藤提出。

下面联系内藤提出的两大主题,回顾一下与这一学说有关的学者们的中世论。冈崎文夫《魏晋南北朝通史》(弘文堂,1932年),把该时代的政治史描绘成自立的贵族势力促使当时的政权实现贵族制国家化的过程。他通过政治史论

证了内藤所谓的贵族政治。宫崎市定的著名论文《论晋武帝的户调式》^⑤，是将土地所有制问题引入贵族制中的研究。他认为，占田制和课田制的并存，正说明了土地所有制中贵族和皇权的关系。战后，宫崎发表了几篇对 A 说所谓的“中世”与“近世”的土地所有制进行比较的考证文章^⑥。不言而喻，这些论文都是为了反驳 B 说而提出来的。宫崎在这些考证中认为，六朝贵族的土地所有制是建立在农奴制耕作劳动力(部曲)的基础之上的。

宫崎在其六朝中世说中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对九品官人法的研究^⑦。宫崎证实，在这一为该时代所特有的选举制度与官僚制度中，始终贯穿着贵族制。如后所述，贵族制和官僚制的关系问题，成为战后论争的中心课题，而宫崎的研究给予这场论争以无可估量的影响。

宫崎提出的另一个论点是聚落史上的变化^⑧。早就主张古代城市国家说的宫崎认为，作为城市与农村未分化形式的城市国家体制至汉末最终崩溃，并分化成为政治军事城市和庄园式的农村。不言而喻，庄园式农村就是地方豪族的生活据点，也就是贵族阶级的经济基础。由此可见，宫崎的六朝研究归根结底与贵族阶级的独立性有关，从社会经济与制度方面深化了内藤的主张。

有意识地将六朝中世论加以发展的还有宫川尚志。宫川从政治、社会、文化特别是宗教等多方面对其主张展开了论述^⑨。“村”的出现，是宫崎中世聚落

^⑤ 《东亚经济研究》19—4，收于《亚细亚史研究》第一、《宫崎市定全集》第七卷。

^⑥ 《宋代以后的土地所有形态》，《东洋史研究》12—2；收于《亚细亚史研究》第四、《宫崎市定全集》第十一卷。《从部曲到客户——唐宋间社会变革的一面》，《东洋史研究》29—4、30—1；收于《亚细亚史论考》、《宫崎市定全集》第十一卷。

^⑦ 《九品官人法的研究——科举前史》，东洋史研究会，1956年；后收于《宫崎市定全集》第六卷。

^⑧ 《中国古代是封建制还是都市国家》，《史林》33—2；收于《亚细亚史研究》第三、《中国古代史论》、《宫崎市定全集》第三卷。《论中国聚落形态的变迁——邑、国与乡、亭与村的考察》，《大谷史学》6；收于《亚细亚史论考》中、《中国古代史论》、《宫崎市定全集》第三卷。《中国村制的建立——古代帝国崩溃的一面》，《东洋史研究》18—4；收于《亚细亚史论考》中、《宫崎市定全集》第七卷。《六朝时代华北的都市》，《东洋史研究》20—2；收于《亚细亚史论考》中、《宫崎市定全集》第七卷。

^⑨ 《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学术振兴会1956年出版，平乐寺书店再版；《六朝史研究·宗教篇》，平乐寺书店，1964年。

论的一个有力依据,而为此打下基础的正是宫川的研究^⑩。此外,有关禅让的研究也与六朝中世论一脉相承。宫川还将这一时代看成是可与欧洲基督教世界相比较的宗教时代^⑪。

值得一提的还有村上嘉实,他在超越汉代礼教的方外思想中找到了六朝的中世色彩^⑫。总之,从战前到战后,京都学派极为丰富多彩的六朝史研究几乎都与中世论结合在了一起。将这一倾向用精神史的术语加以浓缩提炼的,是宇都宫清吉在《东洋中世史的领域》一文中所用的“自律性”一词^⑬。宇都宫认为,时代有着时代的人格,因之将其命名为时代格。他将秦汉的时代格规定为“政治性”,而将六朝的时代格规定为“自律性”。他还认为,既是六朝时代的发展又带几分回归秦汉时代倾向的隋唐时代,则是两者的综合。宇都宫指出,中国的中世始于秦汉,而终于隋唐。其中,最具中世性格特点的,是六朝的“自律性”,而体现这种“自律性”的,则是贵族阶级。所谓“自律性”,即指存在与运动的契机潜藏在时代的内部。从这一意义上说,与以皇权为中心运作的“政治性”不同,六朝贵族是立足于其独立的权威之上的。

京都学派探索的角度是多方面的,但在以下观点上的认识又大体一致,即认为六朝社会以贵族阶级为中心,孕育出了与运用皇权进行管理的体制截然不同的世界,进而成为社会的主体。所谓截然不同的世界,其出现的基础为何,将在后文中予以介绍。总之,京都学派将这一时代视作与秦汉在本质上截然不同的时代,并称其为中世。

与A说相反,B说的观点从与秦汉的连续性上来理解六朝。最早在战后提出这种见解的是前田直典。前田批判A说的论点大致有二:其一,六朝时代大土地经营中的主要耕作劳动力,并非A说所称的部曲(农奴),而是如其师加藤繁所云的奴婢(奴隶);其二,均田农民并非国家的农奴,如徭役负担过重一点所

⑩ 《论六朝时代的村》,收于《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

⑪ 《中国古代末期的佛教与道教》,收于《六朝史研究·宗教篇》。

⑫ 《六朝思想史研究》,平乐寺书店,1974年。

⑬ 《东洋中世史的领域》,《东光》二;收于《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弘文堂书房,1955年。

示,他们是一种半奴隶性质的存在^⑭。也就是说,不论私人还是国家土地所有,双方都是依靠奴隶制劳动来经营的,因此应将这一时代列入古代的范畴。

其中,就私人经营中的奴隶制进行更加具体论述的,当数 1950 年前后的西岛定生^⑮。众所周知,当时西岛认为,封建父家长统治下的家内奴隶制是春秋战国氏族制解体后产生、发展起来的豪族的阶级基础。但是,这里的奴隶制,是加上了家内奴隶制这一限定的奴隶制。他认为,豪族阶层把周围的共同体农民(佃农)以假田民的形式控制起来,将之作为父家长统治下的家内奴隶制的补充。西岛把这种奴婢和假田民的复合形态规定为中国型奴隶制。

这种关于中国型奴隶制的构想也有两个侧面:其一,主张历史唯物论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发展阶段的规律也贯穿于中国历史;其二,这一设想还顾及到了中国的特殊情况,认为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发展阶段的规律是按中国固有的特色表现出来的。不过,西岛的构想是前者为主,后者为次,只是在家内奴隶制的基础上才产生了假田制。但是,后来他又放弃了这一观点,提出了新的见解。这是西岛向后者即中国社会的固有特色大大倾斜的结果。

那么,西岛就秦汉时代提出的父家长统治下的家内奴隶制,在秦汉以后的时代是怎样发展的呢?西岛本人虽然预测,随着时代向六朝隋唐演进,其结果必然是发展成作为古代奴隶制的均田体制,但他并没有用史实加以论证。然而,堀敏一在探讨唐宋变革的意义时,涉及了这一问题。他也将均田制看作中国古代奴隶制的最终形态,还根据周藤吉之等人的研究,认为继古代奴隶制的解体而起的佃户制,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如此一来,说唐宋变革基本上是从古代奴隶制社会向中世封建制社会转变,也就顺理成章了。那么,作为中世封建制权力体系的宋朝以后的国家,又是如何形成了被内藤称为君主独裁政治的集权官僚制国家的呢?堀敏一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即致力于解决这一问

^⑭ 关于这一点,援引了渡部义通关于日本古代班田制的奴隶制性质的见解。

^⑮ 《中国古代帝国考察之一——汉高祖及其功臣》,《历史学研究》141;《古代国家的权力结构》,历史学研究会编《国家权力的诸阶段》,岩波书店,1950年。两文均收于《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细亚世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后者还是1950年度历史学研究大会的报告。

题。其结论大致如下：由于黄巢起义表现出了古代农民斗争的激烈性，因而地主阶级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集权国家，而这也意味着在均田体制崩溃以后，封建关系的再建十分困难^⑥。

总之，将唐末划为古代的时代分期理论就此宣告成立。在这段时期，奴隶制—封建（农奴）制这一生产方式上的概念成为分期的关键，从而使力图用这一普遍范畴来认识中国史的态度贯彻始终。不久，到了 50 年代后期，西岛收回了自己的奴隶说，随即这种观点全线崩溃。不过，这一观点后来又被西岛用个别人身支配的概念重新构建。他认为，国家亦即皇帝权力从人身方面掌握着每一个人，这种关系即是汉代基本的阶级关系。当然也可以把这种体制理解为所谓总体奴隶制的变种，但是西岛并没有把它定为奴隶制，而是把它当成一种独特的古代帝国统治体制，从而强调了中国古代帝国时代的固有特征^⑦。

那么，从这一观点出发，应该怎样去理解六朝隋唐时代呢？堀敏一后来又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探索。简言之，他的见解就是，隋唐的所谓均田体制是将因汉帝国崩溃而一度遭到削弱的个别人身支配予以重建的体制。在此过程中的六朝时期，出现了种种新的现象，如贵族制、九品官人法、村落、身分制等等。对于这些，A 说认为是中世现象所具有的意义，那么堀敏一是如何认识的呢？他认为，这是国家将出现在国家外围的世界最终纳入到自己的支配体制之中，由此重建了个别人身支配。

堀敏一在整个 20 世纪 60、70 年代得出的见解，集中表现在《均田制的研究——中国古代国家的土地政策与土地所有制》（岩波书店，1975 年）等书中，他的论点和西岛的《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和结构——二十等爵制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1 年）一道，可以说是分期论 B 说重建的结果。上述著作的共通

^⑥ 其后，堀敏一分析了藩镇势力及黄巢起义集团等中唐以后兴起的新势力，论证了这些集团并未摆脱父家长制的性质而封建势力尚未成熟的看法（参见拙稿《关于隋唐政治史的二、三个问题——特别围绕古代末期说》，《东洋史研究》34—3）。

^⑦ 关于西岛观点的转折情况，参见东晋次《秦汉帝国论》，收于谷川道雄编《战后日本的中国史论争》，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1993 年。